

第一章

父亲的政治生涯

第一节 父亲教我唱《国际歌》

从我记事之时起，到我背上书包上学的那一年，约有四五年罢（那时我们住在上海）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和母亲（孔德址）是整天忙忙碌碌。母亲晚上还能见到，因为带我睡觉；父亲则很少见面，白天一早就出了门，晚上回家又关在书房里写文章，那时我早已睡着了。所以，我和姐姐的幼年是在奶奶的教养下度过的。奶奶知书达理，记得在我四五岁的时候，奶奶就给我和姐姐讲《西游记》了，她是把书中的故事用孩子们能理解的浅近的语言讲给我们听的。

在那几年中，父亲还多次离开上海，去了广州，去了武汉，还去了日本，少则半年，多则两年。其中去武汉那次是和母亲一同去的。我长大以后才知道，父亲去广州是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与母亲同去武汉是参加1927年的大革命，而去日本则是为了避难——躲避国民党政府的通缉。

父亲教我和姐姐唱《国际歌》是在1927年夏季，母亲和父亲先后从武汉回到上海之后。那时，父亲突然改变了过去天天不落家的“毛病”，整天呆在三楼的书房里写东西，足不出户，使我十分诧异。这段时间大约有一年。在这一年我和姐姐能与父亲经常见面甚至有了与他亲热一番的机会。也就是在这

段时间里，他教会了我们唱《国际歌》。他和母亲都不是音乐爱好者，严格地说，他们缺乏音乐细胞，还有点五音不全。在他们去武汉之前，我从未听他们唱过歌，只听见父亲独自吟哦过古诗文和母亲教我们念的童谣。

起初，父亲并没有教我们唱《国际歌》，而是在房间里独自低声吟唱，母亲有时也和着他唱，父亲还常纠正她唱错之处。我和姐姐在一旁听多了，也就学会了，有一天我们就当着父亲的面唱起来。父亲又惊又喜，夸我们聪明，便认真地一句一句教我们，还讲解歌词的意思。我们自然似懂非懂，只明白了一点，即全世界的奴隶们要起来打倒资本家，最后要实现“英特纳雄耐尔”，但什么是“英特纳雄耐尔”，还是不明白，只觉得这个东西很神圣，连父亲都崇拜它。

父亲从武汉大革命的熔炉回到上海，是带着因大革命失败的创伤、悲痛和消沉回来的。为了躲避国民党的通缉和迫害，他蜗居斗室近一年。但是，从我们孩子们的眼里看来，父亲的变化却在另一方面：他变得可亲了，变得慈祥了，而且变得会唱歌，会唱不少很好听的歌了。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沉重的日子里，父亲隐居在家中却引吭高唱《国际歌》，这大概展示了他当时精神状态的另一面，正如他在晚年回忆那段历史时所说：“一场大风暴过去了，但引起这场风暴的社会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所以革命是一定还要起来的！”（《茅盾全集》 34卷 392、393页）

也许有人会奇怪，为什么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你们一家老小竟敢在家中高唱《国际歌》？难道不怕杀头！但真实情形就是如此，我和姐姐大声唱《国际歌》，父母亲从不干涉。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母亲才不让我们高声唱《国际歌》，但仍旧允许我们小声唱，只是不要当着外人唱，也就是说，唱这支歌是我们的家庭秘密，不能外泄。那时候，我们已经知道，这支歌是共产党的歌，唱这支歌被国民党、蒋介石知道了，是要坐牢、枪毙的。现在想来，在1927、1928年，蒋介石刚刚在南京站稳脚跟，正忙于与北方军阀内战，还顾不上建立严密的特务机构，警察和宪兵在“宁错抓一百，不漏掉一个”的命令



1925 年春茅盾和孔德沚在上海留影。

下，抓共产党还算“内行”，但对什么是《国际歌》却一窍不通，即使对着这些蠢货大唱《国际歌》，也不会有危险。可是到了 30 年代初，情况就不同了，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基本上已经巩固，军警宪特的“知识水平”也大有提高，所以母亲不再让我们大声歌唱《国际歌》了。父亲除了教我们唱《国际歌》，还教了其他几首革命歌曲，其中有一首《少年先锋队歌》，也是我至今尚未忘记的，记得开头两句是：“走上前去呀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

路。”这首歌使我知道了他人与人之间的称呼还有“同志”这个词，并且觉得它特别亲切。

后来我们长大了，才发现父亲教我们唱的《国际歌》有些音符唱错了。这不奇怪，试想，一个音乐的门外汉，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居然学会了唱歌，而且一发而不可收，这可是一个奇迹，唱错一两个音符不足为怪。这件事也使我从另一个侧面勾勒出一幅 1927 年大革命的如火如荼的画面。

从父亲教我们唱《国际歌》开始，我和姐姐在父母亲潜移默化的熏陶下，渐渐地树立了一个最基本的观念：共产党是好人，国民党、蒋介石是坏蛋。后来从母亲嘴里我们还知道了父母亲曾经都是共产党，陈独秀和毛泽东还是父亲的朋友。又知道叔叔沈泽民、婶婶张琴秋也是共产党，叔叔还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可惜刚三十三岁时就牺牲在鄂豫皖苏区了！

1940 年，父母亲把我和姐姐带到延安，让我们参加了革命。那时我发现，父亲在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中有许多朋友和熟人，可见他当年在共产党内是相当活跃和很有人缘的。可是几十年来，他从未向我们谈论他早年的这段经历，对他曾是共产党员就更讳莫如深，我们只是偶尔从母亲口中听到一些片段。一直到了父亲的晚年，在“四人帮”大施淫威，任意篡改历史颠倒黑白的时候，父亲才突然宣布：要把他早年的经历写出来，“还历史一个真面目”，并向我和孩子们详细讲述了他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那时我才知道，父亲原来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1916 年 8 月，父亲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来到了十里洋场的上海，进了商务印书馆。那年父亲二十岁。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张元济在接见父亲时，发现父亲的英语程度不低，就把他分配到编译所的英文部任初级编辑。一个月后，因父亲对商务新出版的《辞源》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得到张元济的赏识，认为父亲在英文部是“用非其材”，就调他到国文部给版

本学家孙毓修当助手。在孙先生的手下，父亲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译完了一本 25 万字的通俗读物《衣、食、住》，又编了 10 万字的《中国寓言初编》，还为商务出版的《学生杂志》翻译了一篇英国科幻小说家威尔斯的小说《三百年后孵化之卵》。于是又被《学生杂志》主编朱元善看中，硬把他借了去，协助朱编杂志，写社论和翻译科普小说。

父亲最早的两篇论文《学生与社会》和《一九一八年之学生》就是发表在《学生杂志》上的。在这两篇文章中，父亲提出了青年应该追求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有担当宇宙之志，……尤须有自主心，以造成高尚之人格，切用之学问。有奋斗力以战退厄运，以建新业。”又提出青年要有“革新思想”，“即力排有生以来所熏染于脑海中之旧习惯、旧思想，而一一革新之，以为吸收新知新学之备。”当时父亲还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他的思想认识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畴，但他的勤奋、进取心和思想的解放，已在商务印书馆那一泓死水中激起了一个小小的涟漪。

助编《学生杂志》，使父亲有机会从杂志编辑部订阅的书刊中第一次读到了《新青年》，从而大大地打开了眼界。《新青年》提倡民主与科学，主张平等自由、人格独立、个性解放，抨击旧礼教、旧思想、旧文化，把国家的振兴和社会改造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这种种观点，正和父亲的思想相吻合，而且从理论上作了更深的阐述和提高。因为这些理论多来自西方，于是又激起了父亲从西方各种思潮中寻求真理的欲望。在这样的探求中，终于使他把关注点集中到社会主义上来，其中就有马克思主义，但起初仅仅是把它作为当时各种政治学说之一来研究的。

父亲实行“拿来主义”是有原则的，即可以“佩服”但不盲从，借鉴是为我所用。当时他对尼采的学说，罗素鼓吹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都做过细致的研究。他采用一分为二的研究方法，既赞成其合理的内容，又扬弃其错误的观点。经过鉴别才能比较，从比较中再择取真理，经过苦苦的探索，父亲终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父亲走向马克思主义，除了来自自身对追求真理的渴望，还有赖于三个外在的因素：其一，他听到了十月革命的炮声和读到了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庶民的胜利》；其二，“五四”运动的爆发大大激励了他的“参政”意识，开始积极、大量地撰写文章，探讨主义，议论时弊，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在报刊上共发表了论著和译文近 90 篇；其三，与陈独秀建立了联系。



1919—1927

在这里，需要专门提一下张东荪。张东荪是梁启超的弟子，属于“研究系”，当时是《时事新报》和《解放与改造》的主编。“五四”运动后，他在新思潮的推动下也开始研究社会主义，并且和陈独秀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一度与陈合作拟发起和组织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父亲那时撰写的研究社会主义的论文和翻译的小说和剧本，大半发表在《解放与改造》和《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上，因此就与张东荪由结识、熟悉而成为朋友。张曾约父亲写过一篇介绍罗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的长文，还请父亲代他主编了几个星期的《时事新报》。

1919年“五四”运动后，《新青年》内部发生了分裂，陈独秀主张在《新青年》上谈政治，宣传马克思主义，以胡适为首的一批北大教授则对此持反对态度。陈独秀一气之下，便决定把《新青年》移到上海来出版。到上海后，陈就约见在沪的朋友，商量如何在沪继续出版《新青年》。张东荪在被邀之列，他擅自把父亲也带了去，这是父亲第一次见到陈独秀。这次会面，父亲还结识了陈望道、李汉俊、李达和戴季陶，他们见到父亲都表示早就闻名并读过你的文章，想不到还那么年

轻，真是后生可畏等等。其实，除了陈独秀，其他几位当时都不过三十左右，比父亲大不了几岁。这次会面，使父亲从此进入了陈独秀的圈子，加速了他的思想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化和深入。

就在父亲努力探索社会主义的同时，他和叔叔沈泽民于1919年7月，联合了家乡的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和客居在外的学生，在家乡乌镇发起组织了一个政治性的社团——“新乡人社”，其宗旨是反对封建，提倡科学，改革社会，宣传民主，并出版了社刊《新乡人》，由父亲任主编。这是父亲的第一次“参政”活动，他既是组织者又是领导者。“新乡人社”活动了三年，除了出版社刊，还在家乡青年中组织过一些讲演会、讨论会等活动。到1922年，“新乡人社”已发展到五十余人，并更名为“桐乡青年社”。那时父亲与叔叔已经是共产党员，就有意想把“桐乡青年社”的纲领从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但那时会员的成分已相当复杂，其中有一大部分人不赞成社会主义，最后不得不分道扬镳，“桐乡青年社”也就此解体了。这是父亲早年的一次“不成功的”政治实践。

1920年5月，改版后的《新青年》出版了，公开打出了介绍、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介绍十月革命、研究苏俄的旗帜。由于原来的一批撰稿人不再供稿，便只能在上海另辟稿源，父亲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新青年》的“铁杆”撰稿人，而且不拿稿酬。这是刊物同人共同议定的。

就在那一年的5月，陈独秀和李汉俊、陈望道、张东荪等人讨论了发起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问题。7月，这个小组成立了，发起人有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李达、沈玄庐、俞秀松，却没有张东荪。原来张临时退出了，据说是梁启超从日本回来，不同意他参加这个小组，而张又不敢违拗梁启超和脱离研究系。张东荪早年引导父亲结识了陈独秀及其他共产主义先行者，然而他自己却走上了另一条路，站到了共产党人的对立面，世事的变迁就是如此莫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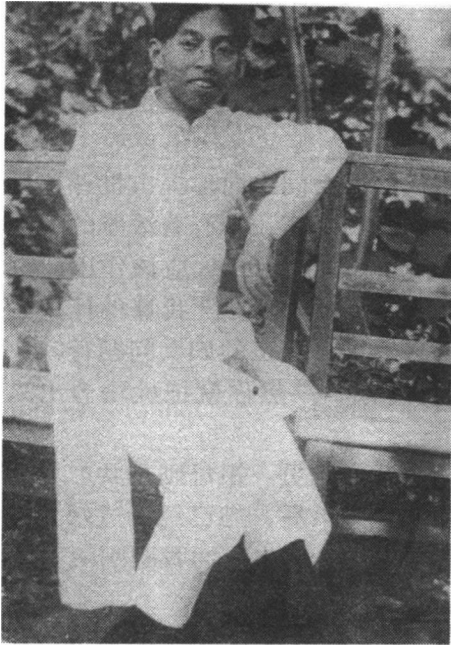
1920年4月，父亲经李汉俊和李达的介绍，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小组的第七名成员，同时加入的还有邵力

子。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父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之一。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决定出版一个秘密发行的党刊《共产党》，专门宣传和介绍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以及第三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消息，由李达任主编，撰稿人都是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父亲参加这个小组后，也就成为刊物积极的撰稿人，翻译和介绍了不少关于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文章。他在晚年回忆道：“通过这些翻译活动，我算是初步懂得了共产主义是什么，共产党的党纲和内部组织是怎样的。”（《茅盾全集》34卷196页）也是在《共产党》上，父亲在《自治运动与社会革命》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指出我们的任务“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刻举行无产阶级的革命！无产阶级的革命便是要把一切生产工具都归生产劳工所有，一切权力都归劳工们执掌，直到灭尽一分一毫的掠夺制度，资本主义决不能复活为止。”（《茅盾全集》14卷204页）这些都证明父亲为了寻找马克思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曾经历了漫长的探索，而他在思想上成为一个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在他加入共产主义小组之后。父亲在晚年总结这段经历时说：“只有看得多，才能比较，才能分辨出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只有这样自己探讨出来的正确东西，自己才真正受用。当然，因此也走了弯路，付出了十分辛勤的脑力劳动，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是不得不然的。”（《茅盾全集》17卷622、623页）这段话也可以当做父亲一生的“座右铭”。

由于经常为《共产党》写稿，父亲与李达的交往也就日趋密切。那时父亲的一个远房姑母王会悟（她比父亲还小两三岁）从乌镇来到上海，父亲把她介绍给了李达，不久他们就结婚了。党的一大召开时，临时把会址转移到嘉兴南湖，就是王会悟出的主意；而在嘉兴租借南湖的游船，则是父亲的内弟孔另境（当时他正在嘉兴中学念书）出力联系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有一条当时从苏俄学来的纪律，即党员不能暴露身份，所以我们家中有了个共产党员，祖母和母亲



1919年2月茅盾在上海半淞园。

一直不知道。直到半年以后，为了消除祖母的怀疑，父亲才告诉了祖母和母亲，事后，党组织也没有批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党成立之初，中央考虑到当时父亲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主编《小说月报》），接触面比较广，便于隐蔽与卜界的联系，所以就让他担任党中央的联络员，组织关系就编在党中央的支部内。支部会每周开一次，就在陈独秀家里，从晚上八时直到十一时以后。陈独秀住在法租界环龙路渔

阳里2号，父亲住在闸北，相距甚远，需穿过半个上海市，所以父亲每次开完会回到家里，早则半夜十二时左右，迟则凌晨一二点钟。起初他对家里谎称是加夜班，但不可能每周都加夜班，这就引起了祖母的怀疑，终于有一天父亲半夜回到家，看见祖母阴沉着脸坐在客厅里。父亲明白不能再隐瞒了，不得不把参加共产党的经过告诉了祖母，并且简单地介绍了共产党的性质和目的。祖母听了点点头说：我相信我儿子选择的道路不会错；这件事你也应该告诉德址，她太信任你了，一点也没有起疑心，你不应该再瞒着她。祖母还说，今后你们也可以到我们家里来开会嘛。

母亲知道父亲已经加入共产党后，很兴奋。那时她在爱国女校学习，常听到同学们议论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知道这是一个代表劳动人民的政党，所以她也很想参加。父亲不同意，认为她水平还低，首先需要学习，等弄懂了共产主义ABC再参

加不迟。后来父亲因忙于工作，就没有再过问这件事，直到1925年4月间的一天晚上，母亲拉着杨之华（瞿秋白夫人）兴冲冲地回到家中，大声向父亲宣布：“从今天起我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之华是我的介绍人。”不等父亲作出反应，杨之华就抢着说：“雁冰同志，我代表妇女同志向你提出批评，你身为共产党员，又是研究妇女问题的专家，却有着浓厚的大男子主义，一点也不关心德址同志的政治生命！你应该作出深刻的检讨！”父亲连忙作揖道歉，一面自谦说：“我算得什么妇女问题专家，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真正的妇女问题行家，还是你杨大姐，我把德址托付给你，果然你就把她培养出来了。”

从此，我们家中就有了两个共产党员。祖母则是共产党的忠实同情者，自从知道儿子是共产党员后，她已经看过好几本关于共产党的小册子了。那年姐姐已经四岁，而我刚刚两岁。

第三节 “妇女问题专家”

杨之华称父亲是“研究妇女问题的专家。”这个称谓对只知道父亲是写过长篇小说《子夜》的我国著名文学家的当代青年听来，也许会觉得不可思议，然而在上世纪的20年代，父亲的确有此美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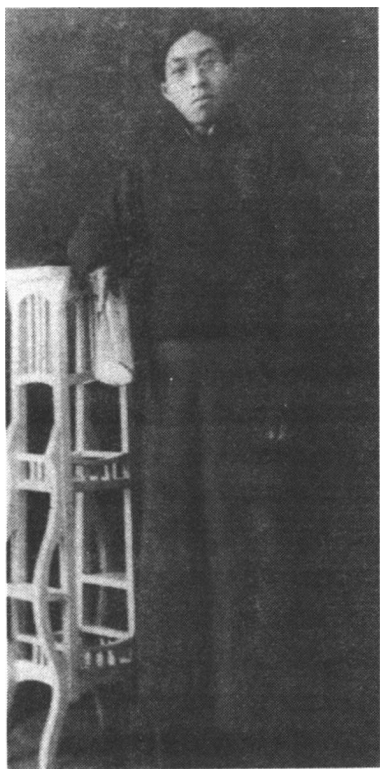
在1923、1924年间，父亲曾经是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的执行委员，该委员会原名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即上海市委），1923年7月改称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并扩大了职能，除了上海市，还兼管江、浙两省的党务工作（相当于建国后的华东局）。父亲是这个委员会的五个执行委员之一，并兼任下辖的国民运动委员会的委员长，国民运动委员会是为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而新成立的。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前夕，共产党既要与国民党团结合作，又要说服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来这个国民运动委员会进行了改组，扩大为统一管理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妇女各方面运动的机构，其中兼管妇女运动方面的有向警予和父亲。

向警予是中国妇女运动第一代的领导人，当时她是党中央妇女部部长、中央委员和《民国日报》副刊《妇女周报》的主编之一。让父亲和向警予同掌妇女运动方面的工作，是因为父亲当时在这方面有些研究，写过不少对此颇有见地的文章之故。从 1919 年秋至 1924 年底的四年间，他曾撰写和翻译了近百篇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分别发表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妇女杂志》上和《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妇女周报》等报刊上。

那四年也是父亲写作的第一个高峰期，四年间的著译共七百多篇，内容则是五花八门，有文艺评论、政论、散文、杂文、童话以及翻译的小说、剧本、诗歌、论文和科普读物等等，其中仅有关妇女问题的就约占 15%。

但到了 1925 年，父亲基本上无暇再顾及妇女问题了，因为从那一年起，他的时间大部被实际的革命工作占据了，如参加“五卅”运动，领导商务印书馆大罢工，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留在广州协助毛泽东处理国民党中宣部的工作和编辑《政治周报》，“中山舰事件”后返回上海担任上海交通局主任，同年底又赴武汉参加 1927 年的大革命，等等。虽然不再写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但他仍被视为“妇女问题专家”，如 1927 年他在武汉中央政治军事学校任教官时，就被分配讲授“妇女运动和妇女解放”等等。

对于父亲关注和研究妇女问题，似乎还可以多说几句。“五四”前夕，凡新派人物，或“唯新是慕”者，都要讲一讲妇女解放问题，似乎已成为一种时尚，当然参与议论的都是男性。《新青年》便经常刊载论妇女解放的文章，父亲就是受《新青年》的影响而注意妇女问题的。父亲研究妇女问题的方法仍是先由“拿来主义”着手：从英文书刊中查找西方与之有关的各种理论，加以比较、衡量，取其合理部分后再揉入自己之新见。当时他较为欣赏的是瑞典女子主义派的学者爱伦凯女士的学说，受她的影响较深，所以他早期的妇女运动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和个性解放、人道主义思想。他认为：凡是人类都是平等的，奴隶要解放，处于



“五四”时期的茅盾。

奴隶地位的妇女自然也应得到解放，而妇女解放的内涵，就是恢复其人的权利，使之能和男性“并肩立在社会上，不分你高我低”

“成个堂堂正正的人”。他认为当今妇女解放首先要从改造伦理，改造两性关系，解决妇女的人格独立入手，就是先从精神方面入手，经济独立的问题可以滞后再解决。对于妇女的政治解放，他重视不足，认为辛亥革命后的“妇女运动是政治的”，“它旨在政治公开，重在平等”；而“当今的妇女运动是社会的”，“它旨在解放妇女也成个人，”故“重在自由”。因此，他对于当时的“妇女参政运动”

持否定的态度，认为这只是

一些上层妇女玩弄的“花瓶”式的参政，为反动的军阀政权涂脂抹粉。由此，他得出妇女运动的中坚力量不是上层的贵妇人，而是中间阶层的知识分子妇女，因为只有她们才懂得人格的独立和婚姻的自由。至于下层的劳动妇女则由于生活的重压和知识的贫乏，使她们对什么是妇女解放还难以理解。

显然，父亲早期的妇女运动观存在着缺陷，其性质是革命民主主义的而非社会主义的。这部分非社会主义的观点在他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之后，在直接阅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问题的经典著作如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后，就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从此放弃了爱伦凯的观点，并宣告：我主张照社会主义者提出的解决法去解决中国的家庭问题

以及妇女问题。

父亲早期的妇女运动观，在对待封建包办婚姻和如何解决的问题上，有其独特的与众不同的见解，在当时十分引人注目。他认为包办婚姻的确没有爱的基础，但既已结婚，就不应轻率地解除婚约，因为“在男子固然可以另想办法；但是女子如何？我不要伊，别人要伊么？……我娶了伊来，便可以引伊到社会上，使伊有知识，解放了伊，做个‘人’”。（《茅盾全集》14卷59页）实际上，当时提出解除包办婚姻的都是男方，而女方的遭遇，或者陪伴公婆守一辈子活寡，或者上吊寻了短见。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封建婚姻制度下，解除包办婚姻，只是男方得到了“自由”，而女方则被推进了深渊，这对妇女解放来说是不公平的。所以父亲宣布：我不把爱情看得很重，却把“利他主义”看得很重，愿以建设的手段来改革包办婚姻。

父亲的上述观点有其思想的动因，即父亲与母亲的结合就是包办婚姻的产物。他们是经历了先结婚，后恋爱，然后相敬相爱，风雨同舟五十年。父亲对母亲的“利他主义”，正是他的“引伊到社会上，使伊有知识，解放了伊，做个‘人’”，这一“理论”具体而微的实践。自然，母亲得以从“包办婚姻”的阴影中解脱出来，除了自己的努力外，还因为有一个好婆婆，一个知书达理，深明大义，毫无封建意识的婆婆。

记得在抗日战争前夕，我曾听到母亲和姐姐的一次对话。那时报纸上有则社会新闻，说一包办婚姻的女子，因被丈夫遗弃而服毒自尽，标题是《封建婚姻之悲剧》。姐姐认为这是包办婚姻的恶果，自由恋爱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母亲不同意，说：“这不能一概而论，我和你爸爸就是包办婚姻，到现在快二十年了，还是和和美美的。问题不在以什么方式结婚，而在结婚后能否建立感情，互相体贴，长久生活。关键在于人。现在自由恋爱闹离婚的还不多吗？而几十年包办婚姻的夫妻，夫唱妇随白头偕老的不也多得很多吗？他们都是先结婚后恋爱的。”姐姐要母亲讲讲当年结婚时的感受。母亲说：“结婚以后觉得自己与你爸爸在哪方面都差距太大，配不上你爸爸，所以大哭了几场。可是你爸爸不嫌弃我，说你这大哭说明你有羞

耻心和上进心，年轻人只要肯上进，就什么都能做到。你奶奶更好，把我当做亲生女儿，把着手教我识字、读书。我发奋从头学起，四年后在语文上就达到了初中程度，搬到上海后又进了爱国女校学习。那时候我和你爸爸已经有了感情，我们是从相敬再到相爱的。再后来就有了你和弟弟。”“那么爸爸当时是怎么说的呢？”“你爸爸对我讲过：没有感情基础的包办婚姻自然是不能提倡的，但既已成为事实，解决的办法就不能是简单的离婚，因为女方是弱者。当初为了不伤父母的心，你同意包办婚姻，为何现在就忍心伤害妻子的心，硬要逼她离婚！我是主张男方帮助女方成长为独立的人，同时培养双方的感情。万一感情培养不成，女方已经有了独立的人格和能力，离婚也就伤害不了她了。我们的婚姻不是证明了我的这个理论是行得通的吗？”姐姐说：“爸爸真是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父亲的上述观点，后来也有所修正，即承认爱情是神圣的，“恋爱不是理智的产物，是感情的产物”，“强令无爱情者发生恋爱”是罪过。但是他虽赞成自由恋爱，却对借自由恋爱之名而行“恋爱至上主义”和“杯水主义”等等行为表示深恶痛绝。这些现象在大革命时期曾在部分革命青年中广为流行。父亲认为“杯水主义”和“恋爱至上主义”是从两个极端对自由恋爱的歪曲和玷辱。“杯水主义”其实是“自由乱爱”，没有真正的爱情；“恋爱至上主义”则是无原则的不分善恶的爱情，他认为追求“善”的爱情是崇高的，而屈从“恶”的爱情则是犯罪。

其实，在父亲的心底，“利他主义”的婚姻观从未放弃过。这从他怀念恽代英的一篇文章中能见到端倪。恽代英是父亲在20年代的好友，曾多次在一起共事。恽的婚姻也是父母包办的，而他处理的方法与父亲一样：从人道主义出发。在抗战快结束时，父亲在一篇纪念恽代英的文章《忆 Y 君》中，写到恽代英1927年初在武汉结婚的经过。新娘是恽的表妹，他们是遵照父母之命结婚的。当时恽是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教育长，这件事在学校中引起了轰动。在一次办公会议上有人提出问题：“不在恋爱的基础上而为了父母之命去结婚，



茅盾夫妇离开武汉前的留影。

应当怎样解释呢？女同志们认为这是助长了封建势力对于青年的压迫。……”恽代英回答道：“这要看当事人是被压迫着去做的呢，还是出于自动。至于什么恋爱呢，在我看来，恐怕也得有个基础。要是在恋爱的基础上和反革命者结婚，恐怕也不足为训。”有人插口问道：“可是人道主义如何呢？”恽代英脸色严肃起来，慢声答道：“除了对付反革命，我倒也不觉得人道主义有什么不对。……而且，人道主义这名词，恐怕不好随使用的。革命，当然不是为了要讲人道主义，革命是为了消灭压迫者，熄灭专制独裁，为了争得被压迫者应当享有的人的权利。我们是为了要使一切人都平等自由，都有幸福，这才来干革命的。要是只顾到什么自私的恋爱而使你的最亲近的人受到痛苦，要是连那为了你而牺牲自我的人你都不能使她幸福，那我们还干什么革命？……当然，前提是你那最亲近的人不是反对你的事业的，你顾到他们的幸福同时并不妨碍革命。同志们 我的意见对不对？”《茅盾全集》12卷258-259页）

恽代英的这一席话，在经历了近二十个春秋之后，又由父

亲追忆记述下来，说明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之间的观点是如此的一致，而刻印在父亲的脑海中又是如何的深刻。当然，这也可能是他借此机会“夫子自道”一番，这足以证明父亲从不认为自己的“利他主义”婚姻观的实践错了，而认为这是个“创造”。

第四节 领导商务印书馆大罢工

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启蒙总是首先在先进的知识分子中间开展和传播，然而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入就必须在工人中首先在产业工人中扎根，这是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把领导和开展工人运动，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建党，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1921年冬，徐梅坤拿着党中央的介绍信来找父亲。徐梅坤原是杭州的一个排字工人，参加共产党后，就被调到上海，使命是组织上海的印刷工人工会。商务印书馆当时是上海也是全国最大的出版印刷企业，它在上海的印刷厂就有三千多工人。徐梅坤既要开展工作，就自然地要把商务印书馆作为重点。父亲当时是商务印书馆党组织的“元老”，又因为编《小说月报》而在馆内外颇有声望，所以党中央让徐来找他商量。那时候，父亲虽然担任党中央联络员的工作，但实际的党务工作还参加得不多，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文学上——编《小说月报》和写文章。所以在商务印书馆内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发展党组织，还局限于他所在的编译所的知识分子范围之内，与印刷工人的接触仅限于少数文化程度较高的技术工人。徐梅坤的到来正好填补了父亲工作之不足。两人商量的结果是先在工人中发展党团员，待形成一定的骨干力量后再筹组工会。父亲就把自己熟悉的技术工人糜文溶、柳普青介绍给了徐梅坤，随后又介绍他们参加了党，他们便成为商务印刷工人中最早的两颗党的种子。

到1923年初，商务印书馆的中共党组织已发展到二十来人。包括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成为当时上海同一单位中

党员人数最多的党组织。为了在工人中宣讲工人运动的斗争史和工人的神圣权利，徐梅坤和父亲在 1922 年“五一”劳动节组织了一次纪念活动，在一块空地上召开群众大会，由父亲上台宣讲“五一”劳动节的由来和意义。到会有三百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工人。可惜那次集会中途被巡捕冲散了。

但商务印书馆工会的成立却一直迟至 1925 年“五卅”运动以后。原因是北洋政府慑于“二七”大罢工的震撼力，明令禁止各地成立工会。“五卅”运动上海全市的大罢工冲毁了这道禁令，各工厂纷纷成立了工会，6 月 21 日商务印书馆也成立了工会，并借虬江路的广舞台举行了有数千人参加的成立大会。会上选出了执行委员二十三人，父亲是其中之一。商务印书馆工会隶属于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它不只包括商务印刷所的工人，还包括商务的总务处、编译所、发行所的职工，这就为后来的商务印书馆大罢工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商务印书馆工会成立后的两个月，发行所属下虹口分店的员工得知当局拟裁减发行所的职工，便在党员廖陈云（陈云）等的发动下秘密集会，并串联了发行所其他分店的员工，以及印刷所的部分工人和管理处编译所的低层职工密谋罢工，要求加薪。这一情况很快被商务党支部知道了，并由父亲和徐梅坤联系后立即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央迅速作出决定：在商务印书馆组织一次罢工，以重振“五卅”以后遭压迫而渐趋低潮的上海工人运动。但又指出，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的民族企业，对新文化的发展是有贡献的，商务领导层中的张菊生、鲍咸昌都是开明人士，所以斗争要有节制，主要达到两个目的，即政治上争得工会的合法地位，经济上争取适当增加工资和改善职工的福利。中央还委派徐梅坤在罢工委员会中组织临时党团，实际领导罢工斗争。临时党团成员包括商务各所的负责党员，父亲是党团的领导之一，负责罢工的宣传工作。

临时党团研究了罢工的组织与发动，认为罢工应分步骤进行，逐步扩大，以便团结和争取尽可能多的非党群众参加。尤其在编译所，那是个知识分子集中的部门，虽然党员人数也最